

国学基础文库

群经要义

QUN JING YAO YI

陈克明 著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国学基础文库

群经要义

QUN JING YAO YI

陈克明 著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群经要义/陈克明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
(国学基础文库)

ISBN 7-300-07552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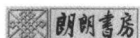
I. 群…

II. 陈…

III. ①经学②十三经—研究

IV. Z1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7450 号



国学基础文库

群经要义

陈克明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50 mm × 229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张 11.8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302 000 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专家推荐意见

陈克明同志广泛吸收前辈学人研究经学的成果,并能提出自己酝酿成熟的学术评断。此书稿有科学水平。

中国经学包罗万象,涵盖了古代文化知识的众多学科。现代人治学,从大学开始,即从事分科分系讲授古代文化。治《诗经》者偏重于文学,治《尚书》者偏重于史学,治《易》者偏重于哲学。实际情况并不像现代大学及研究机构分科分系这样简单,群经之间互有交叉,多方渗融,决不可找出截然划分的界限。学术界学者中,找一位兼通群经的专家已很困难。有些专家有此学识,或因年高体弱及其他原因,能执笔撰写《群经要义》的已不多。陈克明同志是我国学术界少数专家中的一位。他年过七旬,体弱多病,他肯动笔撰写此书,值得鼓励、支持。

陈克明同志自备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续经解》,朝夕披览,寝馈不废,钻研多年,篝灯撰写此书,十分难得。

该书稿纲目谨严,章节明晰,论述亦能要言不费,得其肯綮。此书出版必将有益于学术界。

任继愈

1996年6月20日

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重要地位,在以往的目录学中,经属于四部(经史子集)之首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,经学受冷落,研究经学的著作较少,其实经学还是值得研究的。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,对于古代的经学内容应加以分析研究。

2 群经要义

陈克明同志著《群经要义》，对于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作了较详的说明，对于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“三礼”、“春秋三传”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以及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的主要内容作了较详的阐述，对于历代经学研究以及清儒经学的成绩作了较详的评论。全书资料详实，议论平允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张岱年

1996年6月1日

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

本书作者长期研究经学,曾出版《隋唐经学》、《中国的经学》两部著作。本书在采集有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,对十三经的形成变迁、主要内容和后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,论述细致、深入,得中国经学大旨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

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

叶秀山

1996年7月23日

目 录

引言	(1)
一 《周易》通论	(11)
二 《尚书》评述	(49)
三 《诗经》撷英	(74)
四 “三礼”简介	(109)
(一)《周礼》	(114)
(二)《仪礼》	(137)
(三)《礼记》	(146)
五 “三传”纪要	(164)
(一)《春秋左传》	(176)
(二)《春秋公羊传》	(192)
(三)《春秋穀梁传》	(196)
六 《论语》浅解 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	(208)
七 《孟子》试探	(253)
八 《孝经》初议	(299)
九 《尔雅》揽胜	(332)
本书引用书目录	(369)
后记	(372)

(一) 中国经籍的起源

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，她与埃及、印度等并驾齐驱，通过“摩顶放踵”、“胼手胝足”的艰苦劳动，克服困难，树立信心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灿烂的篇章。由于中国保存的历史文献特多，这些文献记载，后来多被儒家学者们所继承和整理，通常则谓之“经籍”。因此儒家“经籍”乃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，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。

英国李约瑟博士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序言里曾经这样概括：

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。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。各个民族的成就，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，纵情歌颂。

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如此，而其他文化领域里的成就也应该同样看待。后来者可以各自回顾其历史概况，各自描绘其生动情景，但不必在轻重得失上去过多地评头品足，因为时间有先后，条件有好坏，各国祖先的成就难免有大有小、有粗有细。总之，它们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，值得大家为之骄傲、欣赏和推崇。例如希腊哲人苏格拉底，印度哲人释迦牟尼，中国哲人孔丘，他们生活的时间相去不远，成就和贡献则各不相同，但又各有千秋，又何必去评论其长短、优劣呢？

中国文字起源甚早，大概经过象形、指事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

六个发展阶段和形成方式。^①及至夏、商两代才把文字作为记事的符号和工具而刻写在兽骨或龟甲上。其中某些重要文献后又常常铸在各种青铜器皿上,为数不可能太多。延至周代,书写工具稍有进步,逐渐改用木版或竹简,贵重者仍然利用铸造方式,以昭郑重,如铸鼎记事,铸刑书等。对刻写在木版上的文字,后乃常称之为“方版”;对刻写在竹简上的文字,后又常称之为“简册”。故《仪礼·聘礼》曾这样记载:

若有故则卒聘,束帛加书将命,百名以上书于策,不及百名书于方。

根据《论语郑(玄)注》:“古者曰名,今世曰字。”可见“名”、“字”属于一样东西,均指文字,实为同语反复。后来才连在一起使用,已与原来仅指文字又略有不同。看来东周、春秋时期,诸侯各国互遣使者致聘,其文书较长而超过百字以上者则书于竹简,内容较略而不及百字者则书于木版。这种习惯规定,即约定俗成,反映文书的使用已经流行,而木版又不如竹简方便,何况竹简可以装订成册,也较好携带。晋人杜预《左传序》也有相近似的记述:“大事书之于策,小事简牍而已。”唐人孔颖达作《正义》时对此又作了疏解,其大意为:“策”指成册竹简,“简牍”指单片竹简和木版,由于字数有多有寡,而选用材料又可以有所不同,“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,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,方所不容者乃书之于策”。换句话说,当时的文书材料已有三种类型,即单片的竹简,单片的木版,以及装订成册的竹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文字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,书写的工具势必随之改善和增加。但当时尚未发现利用布帛,更谈不上使用纸张,故只能在木版、竹简上多想些办法,因而有上述几种区别。当时装订竹简,常用两种材料,一是用皮条,取名叫“韦”;一是用丝麻,取名叫“经”。在孔子生活时期还多用“韦”。所以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“孔子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”的记载,看来“经”的使

^① 郑樵《通志略·六书序》:“象形、指事,文也;会意、谐声(即形声)、转注,字也;假借,文字俱也。”又谓:“圣人之道,惟借六经;六经之作,惟借文言;文言之本,在于六书。”

用或许较“韦”稍晚。利用丝绳装订竹简,使之成册,称之为经编。它更加符合实际,在使用上也更加方便。

(二)中国经学的形成

“中国经籍”起源较早,但“中国经学”形成则较晚,应该说是形成于汉代。从西汉到清代末年这两千多年的岁月里,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,中国经学也随之壮大和成长。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论是采取“文武并用”即“软硬兼施”的策略,还是采用“儒法合流”即“阳儒阴法”的治术,尽管不断变换手法,但在认识上都存在一个由不自觉地比较自觉的过程。秦始皇并吞六国后,雄心勃勃,原本想“一世、二世、万万世”,可是由于缺乏经验,他偏重“学在官府”,力求“同文”、“同轨”,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,但“仁义不施”,加上“攻守势异”(贾谊《过秦论上》),只知实行高压统治,不知安抚百姓;只知一味进攻,不知留有余地,故严重脱离群体,变成孤家寡人,遂遭惨败,仅维持约三十年。

汉代统治者利用前车之失,作为后车之鉴,总结了秦代速亡的经验教训,深知在马上可以得到天下,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的道理,改而采用“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,文武并用,长久之术”等建议(《史记·陆贾传》),实施“文武并用”的治国方针。汉高祖也由轻视诗书,转而重视诗书。首先起用儒生叔孙通等人制订朝仪,并逐步走向礼治和人治。虽在文、景二帝时期,曾经一度出现侧重“黄老之治”的稳妥做法,即提倡“在上无为”、“在下有为”等予民休养生息的政策,但“文武并用”的基本方针并未动摇。经过约四十年的摸索试验,社会逐渐趋于稳定,生产也有所发展,但同样出现某些消极因素,而且难以克服。汉武帝即位不久,乃在建元五年(公元前136年)置“五经博士”,并接受儒生董仲舒的提请:“凡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,然后统纪可一,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。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此即后来常称之为“独尊儒术,罢黜百家”的建议。上述建议又是董氏“天人对策”的最后部分和核心。追源溯流,实行“罢

黜百家”，丞相卫绾早有类似的设想。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，“丞相（卫）绾奏：所举贤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，请皆罢。奏可。”（《汉书·武帝本纪》）可见百家之言，汉武帝即位伊始，由于它们淆乱视听，有害国政，早已不受欢迎，不过董仲舒加以促成而已！这反映重视儒术、发展经学，乃汉代思想潮流的总趋向。汉代统治者之所以促使这种局面的急剧转变，是由于认真总结成功失败等经验教训所造成。因秦代偏重“法治”，出现过“刻薄寡恩”等情况，固然不利于统治；而汉初提倡“黄老之治”，又过分强调遵循旧规，同样也不利于发展。必须重视“文武并用”的进取精神，兼用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修持工夫，推行“三纲五常”，即“君臣有义、父子有恩、兄弟有和、夫妇有顺、朋友有信”等行之有效的做法。加上儒家提倡践履，力图设法将国家、家庭和个人构成一个团结互助、鼓舞前进的整体，因此儒家思想很能适合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。“儒术”既然受到“独尊”，儒家著述的各种经籍自然也会受到重视。儒家祖先周公、孔子等，不言而喻，又自然会受到敬仰。由于先秦时期儒家仅为“百家”之一，加上秦代又曾经“焚禁诗书”，所以到了汉代，经籍大多残缺不全，故首先必须解决传授和整理等问题。但当时凡能口传面授的则尽量加以记录，否则只好通过搜集残卷，发现藏书，来解决有关需要。这样，必然又将出现文字有古今之辨，地区有齐鲁之分，得到承认者有先后之别等等问题，难免酿成派别纷争、门户对立、人主出奴、此疆彼界等情况。在汉代经学领域里很快掀起各种不同论争，而且愈演愈烈。我们要想弄清有关情节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，确实不太容易。幸而前人在浩如烟海的经籍里，从事开拓经营和钩玄提要等工作，留下不少研究成果，可供后来者参考和研究。

（三）中国经学的历史地位

儒家经籍，本来并非“一家之言”，而是中国文化长期积累留下的产物。它体现了古代哲人的劳动成果和聪明智慧，可以说它是中国文

化的摇篮和总汇,也是中国最早和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。它的内容十分丰富,涉及范围很广,试图探讨宇宙和星球的起源,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生长形态以及天文、地理、物产资源、风土人情、民歌国颂、典礼制度,甚至占卜、筮辞以及鸟兽、草木、虫鱼等等,几乎应有尽有。其内涵既包括自然科学,又包括社会科学,大至于治国、平天下,小至于齐家、修身、养性,都可从经籍里发掘出各种有关资料,搜集到各种珍贵信息,把握理性,悟出真知,我们不妨借用中国一句古话来形容:中国经学也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(《中庸》)。若从深奥难测的理论高度去观察,有些道理至今尚难加以穷究;若从一般实际运用的角度去驾驭,它们又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,真是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”。我们这样来形容它,绝不是什么有意夸大,而是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写照。

中国经学同群体、家庭、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,甚至有些内容直至现代还在不断发挥作用和影响。例如人际关系中一向提倡的忠、恕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等道德观念和规范,不少则是万古长春,永不凋败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活与生存,必须时刻同外界发生各种交往和接触,那么“尽己之谓忠,推己之谓恕”;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”;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;以及互敬互助等等原则就必须遵守和运用。而上述规范和道理乃在中国儒经里反复出现。因此中国经学是文化风尚的母体,也是中国人民健康成长的抚育者。其中某些规定,现代中国人也许不再直接受其支配,但间接还受其制约或影响。例如孔子曾经说过: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;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人们直接受到诗、礼支配的时代,虽然早已过去,但若从学诗、学礼所包含的广义来说,“诗”系泛指各种有韵文学,若不懂得中国有韵文学所派生的歌谣等,较难从事写作与交谈;“礼”乃泛指立身处世的普遍原则和道理,若不懂得人我之间的准绳和要求,也较难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。因此所谓学习诗、礼永远不会成为过去。时代在前进,认识在提高,某些原理、原则也在不断更新和充实。中国经学既然对文化风尚、哲理政论和人们思想言行长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,那就不是通过某种政治革命运动或思想清理工作所能改变或消灭

的。我们对过去某些偏激做法不必深责，旧梦也不必重温，只要采取认真负责、正确对待的态度，用其可用，去其当去，“弃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继承和发扬其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，充实人生的思想内涵，提高大家的道德素养，自我完善，自我珍惜，不再自我糟蹋，不再自我毁灭。因为“尔虞我诈”的社会，绝不是健康的社会，“数典忘祖”的人，也绝不是完美的人！

(四) 中国经籍的主要内容

中国经籍究竟包括哪些内容？也是首先应当说明的一个问题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师徒在“诸子竞起、百家争鸣”洪流的激扬下，根据古代的图书档案，特别对宇宙形成的学说、政治的发展蓝图、道德行为的规范及其要义等比较感兴趣，故将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融会贯通，加上自己的缜密思考和逻辑推理，次第编成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种古籍。开始还叫“六艺”，后来才叫“六经”（见《庄子·天运篇》及《天下篇》）。或说《乐》经早亡，或说《乐》经未曾编成，流传下来的实际只有“五经”。经过秦代的焚书浩劫，除《易》为“卜筮之书”得以侥幸保存外，其余各经大多惨遭不幸。进入汉代，“五经”均残缺不全。前面提到：儒生和儒经在汉代初年尚未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，故又耽搁了几十年的时间。后来“五经”才被提上议事日程，立于学官，设置博士，国家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，吸引大家从事经籍的整理和研究。在此基础上，“五经”再经过不断的扩充，“礼”又分为“三礼”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；《春秋》也分为“三传”，即《公羊春秋传》、《穀梁春秋传》和《左氏春秋传》。外加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合在一起，这时统称之为“九经”。汉、魏时期曾将这“九经”刻在石上，立于国子学内，用以表示郑重和文字划一。继而又将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尔雅》上升为经。到了唐代，“十二经”已经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。到了宋代，大儒朱熹又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并将《孟子》从诸子里分离出来，上升为“经”，且与《论语》并列，编在一起，命名为

“四书”。故原有的“十二经”，增加《孟子》之后，则变为“十三经”。从南宋到清末，“十三经”的称号一直保持未变，这是“十三经”编辑的大致过程。它们排列的次序是：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。清代阮元刻印了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这是后来比较流行的常见本。近年又将该书重印。

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“独尊儒术”，曾经想尽各种办法。归纳起来也不外乎两种：一是提高儒家学者的地位，二是加强对儒家经籍的宣传。“士农工商”，“士”则列为四民之首；“经史子集”，“经”乃居于群书之冠。汉代先后立于学官的“五经”，均设置博士，博士又可带领弟子，他们身居高位，日食厚禄，研治经籍，传播儒学。实际从此以后，经学长期受到重视。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，玄学、佛学一度盛行，不免稍领风骚，但儒学的地位并未降低多少，一因儒学早在历史上占有优势；二因谈玄、赞佛者也有不少出身于士族，开始还常以《易》、《老》并称，到梁时又将《庄》、《老》、《周易》称为“三玄”。除出家为僧、为尼、为道士、为女冠者外，在家修行者又多称为“居士”，平日的生活习惯则常与儒生文人大致相同，这既反映士族的地位没有多少改变，同时还反映儒生的风尚早已深入社会人心。故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对经学的研治并未中断。研治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流派：一派侧重探讨经学原理，常与释、道同流；一派仍守汉末旧习，多在章句训诂上耗费心力（参看吕思勉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第二十三章）。到了隋、唐时期，建立科举考试制度，共设六科，其中主要为进士、明经两科，进士科考试经义，侧重采用诗文形式予以表述；明经科考试经文，要求应试者牢记默诵章句。国家典试后来又分别在礼部、吏部举行，先从礼部考中进士、明经等，均属虚衔；再经吏部考上博学鸿词，才有实授机会。总之，科举制度的吸引力很强，成为读书人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一条捷径。考中后，不仅身份抬高，而且从政有望，此乃宣传儒学、重视经籍的主要良策。而释、道两教则无此机缘（唐代偶尔仿效试行，但为时较暂）。类似的科举考试，一直延至清末不变。元、明、清三代还将策论改为制艺，即八股文。尽管考试的内容稍有变化，但开科取士，吸引人才，提倡读经，要求通

经,其主旨则始终未变。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一面牢笼儒生为其所用,一面发挥儒经影响使之渗透到意识形态各个领域,则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既定国策和不变方针,因而也相应促使儒生对经籍研讨的愈益深入和发展。在封建社会里,一个人从小到大,莫不时时刻刻要同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,熟读钻研,信奉遵行,几乎成为每个人思想、言行的最高准则,读书只能照本宣科,反对离经叛道。我们应该看到经学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,但对中国风尚的消极影响,也不可掉以轻心。

清代章学诚曾经提出:

六经,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,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(《文史通义》卷一《内篇一》)

章学诚提出“六经皆史”,此论概括性较强,后来得到较多学者的欣赏与赞同,如龚自珍、章炳麟等。龚自珍乃说:“夫六经者,周史之宗子也。”又说:“故曰六经者,周史之大宗也。”(《定庵续集》卷二《古史钩沉论二》)章炳麟也说:“学诚以为六经皆史,史者固不可私作。”(《国故论衡》中《原经》)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,其中不少多来自“官书”;龚自珍则进一步补充,他认为“六经皆史”,其中不少是出自“周史”;章炳麟又认为“六经皆史”,说明其中多数不是“私人著述”,尽管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,但内容则大体一致,不过略作补充、说明而已。此处不妨代作归纳为:《易》是卜筮之史,《尚书》是周代以前之史,《礼》则多是周代典章制度之实录,《诗》乃多是周人民歌国颂之写真,《春秋》则是东周至战国初年各国之大事记。证明“六经皆史”可以成立。章氏等上述有关论点,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六经的理解和认识。

总之,儒家“六经”演变成为“十三经”,它是我国最早和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,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,曾经盛行和发展了约三千年。汉唐以后,世界各地和中国的交往逐渐增多,儒家经籍和经学也随之散布世界各地,并扩大其影响。

据《旧唐书·日本传》记载:武则天长安三年(公元703年),日本

乃派大臣真人前来贡献方物,“真人好读经史,解属文”。看来经学早已传入日本,而且受到重视。唐玄宗开元元年(公元712年),日本“又遣使来朝,因请儒士授经”。反映经学已在日本生根发芽。从此以后,使臣、僧侣往来更密,文化学术交流机会更多。

高丽、百济、新罗距离中国更近,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更早。例如高丽人“俗爱书籍”,各家常在街衢建造“大屋,谓之扁堂”。子弟未婚之前,昼夜于此读书、习射,其书有五经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,尤其爱重《文选》。唐代初年,两国失和,酿成战争,后得平定。百济人“岁时伏腊,同于中国,其书籍有五经、子、史。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”。新罗“其风俗、刑法、衣服与高丽、百济略同”。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(公元649年),新罗遣使来朝,“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,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《晋祠碑》,并新撰《晋书》”。唐玄宗开元十六年(公元728年),新罗“遣使来献方物,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、问经教,上许之”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737年),新罗王卒,玄宗派遣左赞善大夫邢琚前往吊祭,并册立其子。玄宗谓邢琚曰:“新罗号为君子之国,颇知书礼,有类中华,以卿学术,善与讲论,故选使充此。到彼,宜阐扬经典,使知大国儒教之盛。”(以上均见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)可见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在隋、唐时期已经不断受到儒家经学影响。在统治者心目中,儒教既是立国之本,经学也是兴国之方。除本国臣民应当学好外,友好国家似乎也在仿效。唐玄宗虽然偏爱道教,但在国与国之间有关交往上,仍然重视儒教,宣扬经学。反映此时儒经、儒学地位已十分重要。

南诏于唐初归附,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(公元738年),诏授皮逻阁“特进,封越国公,赐名归义”,从此日渐强盛。皮逻阁卒后,其子阁逻凤继立,并袭封云南王。当时相州人郑回,天宝年间由明经出任西泸县令。被掳后,阁逻凤“以回有儒学,更名蛮利,甚爱重之”。并命郑回教其子凤迦异和其孙异牟寻。异牟寻继立之后,又命郑回教其子寻梦凑。郑回“久为蛮师”,授学时可施“箠撻”。“故牟寻以下,皆严惮之。”后又以郑回为清平官(即宰相),遇事咨询,秉政不懈,等等(见《旧唐书·南诏传》卷一九七)。可见南诏也深受儒教、儒经影响,而且能够做到尊师重道。

后来通过文化传播,外交往来,商业流通,中国各种儒学经籍几乎遍及世界各地,充分说明儒经生命力极强,影响甚深。其中又以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左传》等更为突出。不少人认为,有关著述,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是人间瑰宝,举世珍品,应该加以重视和研讨。